

关于“文革”前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变动的考察

□段 炼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 100091]

[摘要] 1966~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前期阶段,这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结构变动之大、之复杂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本文试图从平均年龄、平均工作时间、职业分布、人事变化等方面入手,从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逐层进行分析,初步总结了结构变动的特点。

[关键词] “文革”前期; 中央领导机构; 成员; 变动

[中图分类号] D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0)01-0048-04

1966年初,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中央主席1人、副主席5人、总书记1人)。他们平均年龄58岁,平均入党时间33年。建国以前曾在国外生活、学习、工作过的6人。曾经在大学学习过的2人。曾经从事工人运动或有工人经历的5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1人,军事工作的2人,党务理论宣传工作的1人。

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6人。他们平均年龄56岁,平均入党时间31年,1949年以前曾在外国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17人。在大学学习过的11人。从事工人运动或有工人经历的6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6人,军事工作的7人,党务理论宣传工作的4人。担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或各部委领导的13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委4人,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常委5人。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共13人(总书记1人),他们平均年龄52岁,平均入党时间33年。负责经济工作的6人,军事工作的3人,党务理论宣传工作的4人。担任国务院领导职务的10人,担任全国人大领导职务的4人,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的3人,其中有政治局委员5人,常委1人。

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年龄适中,都是职业革命家,早年出过国的占半数多,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将近半数,整体文化程度较高。

1966年夏天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于8月召开了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会议,并对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作了调整。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主席1人、副主席1人)。常委平均年龄66岁,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58岁。平均入党时间42年,时间最长的是45年,最短的是39年。1949年以前出过国的9人。曾经在大学学习过的5人。曾经从事工人运动或有工人经历的5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2人,主要负责党务理论宣传工作的4人,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2人。参加过长征的8人。

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6人。其平均年龄73岁,年龄最大的80岁,年龄最小的57岁,年龄相差23岁。平均入党时间40年,时间最长的45年,最短的33年,时间相差22年。1949年以前出过国的14人,约占委员总数的54%。曾经在大学学习过的8人。从事工人运动或有工人经历的7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6人,主要负责党务理论宣传的4人,军事工作的8人。担任国务院职务的有11人,担任全国人大职务的6人,担任全国政协职务的6人。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2人(常务书记1人)。其平均年龄61岁,平均入党时间37年。负责经济工作的5人,负责党务宣传理论工作的3人,负责军事工作的1人。担任国务院职务6人,担任全国人大职务的4人,担任全国政协职务的2人,其中

[收稿日期] 2009-03-20

[作者简介] 段 炼(1978-)男,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有政治局委员8人,常委4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和平均入党时间都有所增长,初步出现老化倾向。常委新增成员都是负责党务理论宣传的,从中可以看到“文革”发动在即,理论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平均年龄和平均入党时间也有增长,出现了80岁、70岁的委员。委员中出国的比例下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下降,整体国际阅历、眼光和文化程度出现下滑。负责军事工作的比例有所增长。

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增加4人,名次提前1人,委员增加9人,候补委员增加3人,原有3人不再继任。书记处增加5人,原有4人不再继任。

“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之一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其由政治局常委领导,共由13人组成(另有4人为地方各大区代表,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其平均年龄降48岁,平均入党时间32年。小组中有常委3人、委员3人,并增加军队代表2人,在国务院任职的有4人、在全国政协任职的有1人。改组后的中央文革小组当中,陈伯达、江青、戚本禹担任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1]。毛泽东希望这次调整能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因此新增成员当时大多是“文革”运动的支持者。此次调整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1)对刘少奇、邓小平造成极其不利的政治冲击。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排名落到第九,从此离开工作岗位。邓小平在常委的名次虽然没有变,但彭真等人离任对他冲击不小,因为以前“书记处的工作他(邓小平)就抓彭真”^[2]。改组后的中央书记处由常务书记陶铸领导,邓小平的总书记一职实际上是有名无实。2)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性凸显。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大幅度作了调整(超过政治局的更换幅度),担任政治局常委、委员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两个组织机构将是政治局领导下主持“文革”日常工作的两大权力机构。书记处主要负责工、农业生产,保证经济建设大局;文革小组主要负责开展“阶级斗争”,实现“文革”既定目标。在后来许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被打倒后,中央文革小组一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权力机构。

二

直到1969年,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大变动。这一

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及候补委员。

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5人(主席1人、副主席1人),平均年龄69岁,年龄最大的为76岁,最小的为62岁。平均入党时间45年,时间最长的为48年,最短的为42年。以前出过国的4人,曾经在大学学习过的3人,从事过工人运动的2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没有,主要负责党务理论宣传的2人,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1人。参加过长征的3人。在上届常委中,有6人没有继任(刘少奇、陶铸已过世),更换率高达54.5%。

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25人。他们平均年龄59岁,比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低14岁,55岁以下10人,占委员总数的40%。平均入党时间33年。曾经出国8人,在大学学习过的4人,从事工人运动的3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2人,主要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5人,负责军事工作的11人。往届中央政治局中有13人被打倒或停职(刘少奇、陶铸、贺龙已过世),更换率高达52%。新增委员、候补委员占委员总数的50%。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老化呈上升趋势。在“文革”前三年中,全党任务是开展“全面阶级斗争”,常委里没有人具体分管经济工作。在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层面则出现了年轻化趋势,55岁以下的占了近半数,其中姚文元的年龄最小,入党时间最短。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大都进入了政治局。

在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具有国际阅历的人数减少,平均文化程度下降。分管经济工作的比例亦下降。本届更换率达到了过半数的程度。

在基本结构变动中,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更迭还有3个特点,这与八大的变动迥然不同。

(一)在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数量大大减少。

在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担任国务院职务的有5人,担任全国人大职务的只有4人、担任全国政协职务的也只有4人。当时的国务院受到极大冲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文革”开始后停止了工作。

(二)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同时被取消。

为便于中央工作的协调,九大制定的新党章取消了中央书记处。

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势过大,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矛盾甚多。而且内部矛盾复杂,先后有9人被打倒或逮捕,占其成员总数的69%。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实

际上被取消,停止了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江青集团的发展。

(三)林彪军人集团快速发展与毛泽东的对策。

九大后,林彪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林彪、叶群夫妻共同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这在党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毛泽东对上述变化保持着高度警惕。他说:现在的中央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3]。这是借苏联之口来指出军人权力的过度膨胀。对此毛泽东在九大组织安排上抑制了林彪集团的发展,政治局常委中军队代表仍是1位,委员、候补委员中军队代表有11位,占委员总数的44%,没有过半数,只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长了13%。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进入政治局,军队委员中还有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等人,这都对林彪集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牵制。

三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有97人。其平均年龄为54岁,平均入党时间为31年。1949年以前出过国的有38人,占委员总数的39%。在大学学习过的31人,占委员总数的32%。委员中从事过工人运动或有工人经历的有15人,约占委员总数的15%。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13人,约占委员总数的13%。负责党务理论宣传工作6人,负责军事工作26人,约占委员总数的27%。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结构与其政治局的人员结构基本相同:都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分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72%)和军人(27%)两大部分。

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4]。其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面清理领导队伍中“变修、变质”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文革”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5]。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组织上实现“吐故纳新”。

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共170人。其平均年龄为55

岁,与往届持平。50岁以下的有42人,约占委员总数的25%,30岁以下的有4人。平均入党时间为32年,最短是5年。委员中1949年以前出过国的有20人,约占委员总数的12%,比往届低了27%。曾经在大学学习过的有11人,约占委员总数的6%,比往届低了25%。委员会里工人委员25人,约占委员总数的15%。农民委员有11人,约占委员总数的7%。负责经济工作的有7人,约占委员总数的4%。负责党务理论宣传的有5人。负责军事工作的有59人,占委员总数的34.7%。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除了与其政治局成员结构变动相同外,九届中央委员会还有3个特点:1)中央委员更换率很高。“头一次进中央委员会的占名单的大多数,七大没有这么多人,八大也没有这么多人。八届中央委员只到了50多人”^[6]。这次中央委员更换率之高是惊人的,更换率高达75%,竟然超过革命年代的七大、八大。往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继续当选的只有43人。2)工、农、兵委员占绝对多数。“选工农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过去有,这次是主要的。解放军是大多数,也是出身于工农的”^[6]。九届中央委员会里军人占34.7%,工人占15%,农民占7%,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占43.3%,从比例中可看出军人、工、农比例超过半数,形成了对领导干部的制约、监督,是中共建党以来所没有过的。当时的宣传说,这样结合:“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大团结”^[7]。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普通群众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力度,许多工人、农民走上了政治舞台。从年龄差别、组织安排上看,政治局里有第一接班梯队,工、农委员就是第二接班梯队,十届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正是来自这个第二梯队。九届中央委员会工、农委员中来自生产一线的占了22%,这一安排符合毛泽东的意愿。毛泽东非常看重他们,特意叮嘱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8]。3)“红卫兵”被排斥在外。毛泽东做出“吐故纳新”的指示时,“红卫兵”应是将来中央领导机构的参与者之一。但随后“红卫兵”组织混乱、内争不已,故“红卫兵”没有进入中央权力再分配格局,只在候补中委里加上了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同济大学的陈敢峰。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结构的变动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意愿,即希望领导队伍在“大联合”基础上保持“平民化”、“革命化”。毛泽东希望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9]。但由于这一届中

央委员会是在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许多为党和国家立下不朽功勋的老革命家被诬陷、批斗,甚至含冤去世;一些普通劳动者被提拔到与他们的能力并不相适应的高级领导岗位,从而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江青、林彪等野心家出于个人夺权的目的,混进中央领导队伍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从而严重削弱和干扰了党中央的领导。因此,这样的变动对社会变革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A].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C].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60.
- [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A].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 [3]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A].张化,苏才青.回首“文革”[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985.
- [4]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A].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994.
- [5]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A].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 [6]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及各大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A].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 [7]人民日报编辑部.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N].人民日报,1969-6-9(1).
- [8]毛泽东.对新当选中委的基层干部的要求[A].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 [9]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A].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Study on Change of the CPC Centu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DUAN Lian

(Party School of the Co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n early stage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the mechanism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Party Changed great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age, working time, occupations distribution and personnel changes.

Key words early stage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entural Comittee; members; change

编辑 戴鲜宁